

#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

——以科索沃宗教冲突研究为例\*

章 远

**内容提要:** 宗教因素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曾一度被“流放”出国际关系学说的视野,但在冷战两极对抗格局结束之后,它重新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宗教复兴与假借宗教之名的暴力循环现象相伴生,典型的例子为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持续出现与宗教有关的政治冲突。西方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不同研究层次、不同行为路径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框架,寻找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然而在西方宗教与冲突议题的研究流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宗教角色地位的争论,其研究的客观性值得质疑。

**关键词:** 宗教因素 地区冲突 科索沃冲突

冷战的结束打破了旧有的政治格局,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获得独立表达利益诉求的新契机,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深化而日渐增强。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当地民众对意识形态广泛怀疑的舆论氛围和心理环境,给予了宗教以复兴的机遇。这个新的拓展空间对于曾经一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被“流放”<sup>①</sup>出国际关系学说视野的宗教来说,不妨看做是宗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回归和复兴。2008年8月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千禧年论坛绽放着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项目批准号 05& ZD013)的中期成果。

① See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i, “The Return from Exile: An Introduction”, i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i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1-18.

玫瑰色的光泽,各大宗教友好共存、创建和平的远景似乎并非海市蜃楼。可是,寄希望于宗教实现冲突转化功能以推动和平建设的设想尚未有所建树,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涉及宗教问题的暴力冲突就扰乱了全盘理想主义规划。

欧美学界对于冷战后宗教复兴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sup>①</sup>散见在各学者研究成就之中的论述就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后冷战以及后“9·11”时代宗教和暴力冲突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往复,西方学界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各自的解释框架,以期推导出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指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常常是对抗性的关系。<sup>②</sup>文明和宗教关系密切,冷战后的国际交往中也往往发生牵涉到宗教实体之间分歧的地区冲突,巴尔干科索沃地区正是如此。

## 一 宗教与冲突研究的学科分野

(一)宗教社会学角度。西方宗教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他比较注重对宗教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热点的研究。2008年夏初,伯杰教授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及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几个时代课题,包括:伊斯兰教的强力复兴、基督教福音派特别是五旬节教派在拉美以及全球的大规模增长、世界基督教中心向南方国家转移、世俗化的西欧和非世俗化的中东欧、原教旨主义和新宗教运动在主要宗教中的出现、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宗教结社方式的自由化转变等等。这基本囊括了西方宗教社会学当前可能涉及国际政治交往的现实研究问题。伯格教授认为,宗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某些人群力图抗拒被同化的工具,但其代价高昂。<sup>③</sup>此外,宗教社会学的分支宗教经济学也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将教会、寺院类比于经济生活中

① 关于宗教复兴的观点,中文的译著有[美]彼得·伯格等:《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李骏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英文的专著如:Gilles Kepel, *The Revenge of God: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ott M. Thomas,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Lawrence Sullivan, *Political Theologies: Public Religions in a Post-Secular Worl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③ [美]彼得·伯杰:“全球化文化的动力”,[美]彼得·伯杰、塞缪尔·亨廷顿主编:《全球化文化的动力》,康敬贻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的公司这样的功能单位,认为存在不同宗教间相互竞争宗教资本的宗教市场经济,同时不否认“在某些环境中冲突和竞争都能创造更活跃的宗教团体”。<sup>①</sup>

(二)宗教心理学角度。依据宗教心理学对宗教冲突根源的解读,宗教是基于信仰的文化,信仰主体将信仰对象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理定势,并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一旦信仰主体认为自身的宗教文化受到外来因素的破坏,就会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sup>②</sup>排他性总是作为“区别宗教群体的最主要观念依据”<sup>③</sup>参与人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生活。根据玛丽·乔·梅多(M. J. Meadow)《宗教心理学》一书的观点:“宗教里的许多差别——许多各异的信条、礼仪、戒律、实践和态度等——暗示着人类需要这些差异。在既定的宗教传统内部,气质与人格不同,使多样化成为必要。”<sup>④</sup>他引用弗洛伊德论点推导宗教的排他特性,“宗教是通过要求其成员有一种群体情感来保护自己。密切的群体纽带是通过使一切敌对情绪或消极情绪外化而得到维持的”<sup>⑤</sup>。而将宗教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偏见加同情模式以及面对外部冲击的受害者心理,是宗教心理学给出的另一诠释。如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特(Kalevi J. Holsti)在其《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一书中提到:“同情心往往比权力或者领土更加难以安抚……二战之后世界爆发的冲突之中,20%以上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同情心。”<sup>⑥</sup>

(三)宗教神学角度。宗教神学以特有的思辨模式从认识论出发为宗教暴力冲突行为做出解释。宗教神学大多从对宗教教义和宗教经典文本的解经和释经出发研究冲突,其中最典型的是“正义战争论”。自中世纪起,基督教在为十字军东征寻找神学依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正义战争”的研究,时至近日这一思想还能修正为一度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宗教自由和平论”就可见此研究角度的影响之深广。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概念存在于大多数宗教的神学体系之中,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个一神教神学思想为例,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是末日

① 参见[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② 龚学增:“宗教纷争与国际地区冲突”,《中国宗教》1999年第3期,第27-30页。

③ [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第177页。

④ [美]玛丽·乔·梅多、理查德·德·卡霍:《宗教心理学》,陈麟书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

⑤ 同上书,第548页。

⑥ [加]卡列维·霍尔斯特:《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审判的善恶之战,是神对自己创造的最终目的的实现。在这种末日情怀的招引之下,冲突方都自认为是占据道德正义优势的一方,试图将教义中的神圣审判搬到现实世界中操作和解决现实问题。如马克·杰根史迈尔(Mark Juergensmeyer)就由此认为,可能发生的“新冷战”即引发宗教想象、迫使作出暴力行为的善与恶之战。<sup>①</sup>

(四)政治学国内政治角度。政教关系从罗马帝国时代就是宗教学者研究的主题,当代西方学者对政教关系研究较为典型的是对宗教游说在国家政体中的作用的分析,比如研究美国政体中宗教游说的艾伦·赫兹克(Allen Hertzke)。<sup>②</sup>而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政治的立场战争”概念有助于理解利用宗教牟取政治获利的行径。<sup>③</sup>人为简化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教代表政教合一的立场,基督教代表政教分离的立场,而以色列是含混的立场。在宗教与冲突纠缠不清的历史上,宗教与政治何种结合方式更具攻击性并非绝对,侵略者和受害者的身份也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就认为宗教以多种方式作用于政治分层,成为分裂和对抗的依据。一旦某一群体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宗教通常会提供组织和讲坛,而宗教制度化的发展使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进一步分裂;民族主义不过是宗教的替代物或补充。<sup>④</sup>

(五)国际关系学角度。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与地区冲突之间联系的解释理论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暴力冲突的微观理论<sup>⑤</sup>和文明冲突论<sup>⑥</sup>。除此之外,《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峙世俗国家》认为宗教冲突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

<sup>①</sup>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2

<sup>②</sup> [美]艾伦·D·赫兹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sup>③</sup> Gregory F. Treverton et al., *Exploring Religious Conflic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21.

<sup>④</sup>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第284-286页。

<sup>⑤</sup> 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72页。

<sup>⑥</sup>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著作主要见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战,<sup>①</sup>《宗教、治国术的缺失向度》<sup>②</sup>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sup>③</sup>等论著则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国家安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强大的精神权威和伦理价值观目前正在日益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变量。斯科特·托马斯(Scott Thomas)将全球化语境下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中的作用归纳为八个向度:第一,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模式,这一认识基于宗教交织着封闭的核心价值判断,强调是宗教理念和宗教本身的差异最终造成潜在和既有的冲突积重难返;第二,作为个体和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模式,宗教是区别群体的主要识别来源,全球化在拆分和削弱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进一步构建和强化了基于宗教的社会认同。宗教的认同比其他所有的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更起决定作用,但也更为排外;第三,跨国宗教给予原本不同主权国家内的民众以相同或者相似的信仰体系、道德概念和对某些国际法规的信念,造就了泛伊斯兰主义、泛非洲主义等等的反民族主义之声;第四,宗教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以跨国观念为表现形式,冲击不同信仰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第五,宗教以跨国行为体的结构形式,比如宗教非政府组织,来介入国际政治生活;第六,宗教作为文明或文化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吻合;第七,在后冷战的世界里宗教作为跨国认同共同体,为战胜冲突对手增加了理念上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第八,将宗教视为一种“阐释共同体”,从而避免了以往将现代化与宗教割离的判断。<sup>④</sup>托马斯从国际关系理论向度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宗教对国际冲突问题的影响方式。

科索沃地区的宗教结构主要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和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裔为主,另外还有信仰东正教的罗姆人、说阿尔巴尼亚语的阿希卡利人和埃及裔穆斯林。宗教信仰是科索沃地区划分族裔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准和来源之一,不同信仰的族裔之间不乏以暴力宣泄彼此仇恨的历史。西方对宗教与科索沃冲突的研究目前可循的研究基本偏重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以英国波斯尼亚协会(Bosnian Institute)主席诺尔·马尔库姆(Noel Malcolm)所

①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pp. 3-7, 28-31.

② Douglas Johnston, "Introduction: Beyond Power Politics", in Douglas Johns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6.

③ Douglas Johnston, "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 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9.

④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 1-13.

著《科索沃简史》为代表的历史学观点认为,科索沃是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两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地,科索沃冲突的祸根是从古代帝国统治就埋下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方基于这种巨大历史文化差异争夺优势地位造成相互攻击不断。<sup>①</sup>因此,难以断言科索沃究竟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归于伊斯兰世界。<sup>②</sup>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西方对科索沃冲突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科索沃的冲突是因为前南政府过于宽松的民族自治政策侵害了相关宗教群体利益,产生了培养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乃至发展到对基本人权完全无视的相互杀戮;<sup>③</sup>其二,外部主观的“人道主义”干涉加深了彼此的误解,最终促使这一地区走向进一步分裂;<sup>④</sup>其三,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科索沃问题和谈和救济难民方面有功绩。<sup>⑤</sup>

## 二 宗教与冲突研究的层次分析

(一)强调宗教个人层次对冲突相互作用的研究,借用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言论,宗教冲突问题“从来不在于信仰,不在于圣经、摩西五经和古兰经,而在于信徒,在于人的行为”<sup>⑥</sup>。从个人层面角度的研究有两种倾向,多数观点着重于认定精英,包括政治领袖人物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领导

① 参见 Noel Malcolm, *Kosovo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4; Miranda Vickers *Between Serb and Albanian: A Short History of Kosov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6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位学者阿尔巴尼亚裔的身份使他们的研究遭到塞尔维亚历史学界对其客观性的批判,比如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协会联合多位塞裔学者反驳马尔库姆《科索沃简史》的论文集, Slavenko Terzić et al., *Response to Noel Malcolm's Book Kosovo: A Short History: Scientific Discussion on Noel Malcolm's Book "Kosovo A Short History"* Collection of Works, Belgrad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Serb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1999.

② Noel Malcolm, "Is Kosovo Serbia? We ask a Historian", *The Guardian*, February 26 2008.

③ 持前南斯拉夫从托托政府开始过于放权的民族自治政策为科索沃冲突埋下祸根的观点的著作如下: Martin Dent "Lessons of Kosovo", in Michael Waller et al., *Kosovo The Politics of Delusion*,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p 120-127; Denisa Kostovkova *Kosovo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45-50. 客观地看,这类将科索沃冲突归咎于不当的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观点有为北约干涉南联盟内政造成地区动荡推脱政治责任的意味。

④ 国际社会干预的影响分析论著较多,比如 Eric Herring "From Rambouillet to the Kosovo Accords NATO's War against Serbia and Its Aftermath", in Ken Booth ed., *The Kosovo Tragedy: The Human Rights Dimensions*, London: Frank Cass 2005, pp 225-243; Alex J Bellamy, *Kosovo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156-179;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 *The Kosovo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59-279.

⑤ 科索沃冲突后和谈过程中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参见 Tim Judah *Kosovo War and Reven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02, pp 197-226.

⑥ 叶小文,“宗教:关切世界和平”,《中国宗教》2000年第5期,第6页。

人,在涉及宗教因素的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关于教宗影响力、重要宗教领袖、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等等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sup>①</sup>另外也有一定数量从基层或者边缘的宗教教职人员角度论述的著作,侧重研究他们在冲突激化或者和解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隐秘性关键作用。至于关注于个人宗教身份认同与冲突之间的辩证联系的相关论述也应归属于广义上以个人层面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的研究,这类带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色彩的论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极受关注和推崇,因而数量繁多。<sup>②</sup>“9·11”之后,对宗教恐怖主义个人的研究也引发学界热议,典型的有马克·杰根史迈尔撰写的《从神的恐怖主义者:宗教暴力的全球兴起》<sup>③</sup>。

(二)强调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在宗教或者宗教精神传统之上的群体性社会行为体与暴力冲突之间联系的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信仰的政党、宗教制度化教会、宗教和平运动和宗教非政府组织机构(包括慈善救援组织等)四个领域。政党的宗教背景或者宗教倾向会反映到政党的政策诉求,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统右翼“反共十字军运动”<sup>④</sup>,又如影响力大的宗教利益团体游说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法》法案通过。<sup>⑤</sup>西方研究宗教非政府组织与冲突一般多从人道主义救援立场来分析,<sup>⑥</sup>严格说来,从制度化宗教的组织角度研究宗教在冲突中运作的思路并没有跳脱出宗教研究的传统逻辑。从基于信仰的相关团体和宗教组织角度分析宗教在冲突以及冲突解决中的积极或消极作

① 涉及梵蒂冈外交的专著有 Robert A. Graham, *Vat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与战争之间的关联研究,例如美国自由派批评布什是“福音派狂热分子”进行了一场“反对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战争”,参见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利奥·P·里布福(Leo P. Ribuffo)教授综述布什总统的文章,利奥·P·里布福:“乔治·W·布什、基于信仰的总统任期和晚近的‘福音派威胁’”,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90-619页。

② 仅举几例: Sudir Karkar *The Colors of Violence: Cultural Identities, Religion, and Confli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John Wear Burton *The Sources of Conflict: Violence and Crime and Their Prevention*,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Andreas Wimmer and Donald L. Horowitz *Facing Ethnic Conflicts: Toward a New Reali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③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④ 徐以骅:“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路线图”》,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⑤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2004, pp. 183-184, 207-238。

⑥ See Paul M. Agger in “The Relevance of Organization Theory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in N. J. Demerath et al., *Sacred Companies: Organizational Aspects of Religion and Religious Aspects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22。

用的成果目前似乎仍不算很多,世贸大厦倒塌之后西方理论界引用率较高的学者有史考特·艾波比(Scott R. Appleby),马克·格平(Marc Gopin)以及大卫·斯莫克(David Smock)等等。此外,还在宗教极端势力控制下的宗教恐怖组织也应属于宗教团体组织层面的考察范畴。<sup>①</sup>

(三)宗教在国家层面发生冲突和内战的理论探讨中,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教授的近期研究成果较为典型。福克斯在其多部论著里将宗教视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重合或者叠加,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是政治国家内部群体身份认同来源之一,宗教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对国家内部宗教事务处置不当则极易引发冲突。<sup>②</sup>对于民族国家层面宗教与冲突的研究,有一部分学者专注于政教合一国家与武力冲突之间联系的分析,主要涉及伊斯兰运动之后伊斯兰国家介入的伊朗问题、中东问题等等。目前一般认为,倡导政教合一的宗教排外性强于倡导政教分离的宗教,导致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更大。<sup>③</sup>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有着从无形到有形,从局部到整体多重紧密的联系。<sup>④</sup>

(四)持全球体系层次与全球宗教布局构成这一整体观念的学者主要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比如早期的彼得·伯格)认为宗教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整体式微,世界是“世俗化”<sup>⑤</sup>的,研究国际政治应抛开宗教这块“神圣的帷幕”而专注于政治实体,虽然这一研究成果与西欧社会现实是相对契合的,但对东南欧宗教局势来说却有所疏离。反对的一派则认为当代世界恰恰是“非世俗化”的,

① Martha Crenshaw, "Theories of Terrorism: Instru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in David C. Rapoport ed., *Insid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13-29.

② See Jonathan Fox, *Ethnoreligious Conflic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 General Theo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Jonathan Fox, *Religion, Civilization and Civil War: 1945 through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4;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Religion in World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06; Jonathan Fox, *A World Survey of Religion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关于伊斯兰国家与冲突的研究数量很多,仅举几例: John Kelsay, *Islam and War: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thics*,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3; Sohail H. Hashmi, *Islamic Political Ethics: Civil Society, Pluralism, and Conflic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Emran Qureshi and Michael Anthony Sells, *The New Crusa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

④ 参见徐以骅、章远:“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途径和范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09-116页。

⑤ Peter Ludwig Berger,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7, p. 105.



全球政治的现实是宗教的复兴。上帝非但没有离去,而且上帝还来“复仇”<sup>①</sup>了。世界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何者更有利于人类和平并没有定论,仅就持非世俗化观点的派别看来,认可宗教聚合功能的人群内部大多肯定非世俗化对世界伦理道德的正面建构,从而认为世界非世俗化有助于实现世界范围的公平与正义;但是如果强调宗教的排他性和传播性,则非世俗化可能反而加剧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研究领域在没有北约、欧安会等等外部政治军事因素介入之前,研究往往从宗教领袖和宗教人群的角度,将科索沃的宗教情况放置到前南斯拉夫的地域之内加以综合考察。比如波士顿大学杰拉尔德·鲍尔斯(Gerald Powers)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科索沃和黑山)民众的宗教差别是群体认同以及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核心来源,但是民族主义认同差异和对立才是巴尔干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宗教认同差异。他提出的减少冲突的建设性解决办法是:宗教领袖继续反暴力、反迫害人权,赞美和平,同时加强相同信仰民众间的宗教纽带。<sup>②</sup>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年轻学者戈尔兰奇鲁斯·杜伊辛格斯(Gerlachus Duizings)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是不多见的当代科索沃宗教与政治状况专著,书中同样基本选取宗教领袖与国家互动的研究视角。杜伊辛格斯分析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间的历史与现实之后提出,失败的民族融合、民族国家碎片化和宗教身份认同含糊不清是地区动荡的主要根源。<sup>③</sup>

科索沃战争之后,针对宗教作为冲突的调解者的研究日渐丰富。有学者和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对宗教情感激发和平调解的成就,其中针对运用信仰洞见和专业技能积极参与、努力缔造和平的宗教“草根”教职人员的研究论述较为引人注目。比如《行动中的和平缔造者》一书专门设单独章节详细介绍科索沃塞尔维亚裔热心政治的东正教祭司、德卡尼(Děćani)修道院的萨瓦神父(Fr Sava

① Gills K epeJ *The Revenge of God: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Christianity, and the Judaism in Modern World*, p 19

② Gerard F. Powers “Religion, Conflict and Prospects for Reconciliation in Bosnia, Croatia and Yugoslav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0 No 1, Summer 1996 p 231.

③ Ger Duijzings *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Kosovo*,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00, pp. 203, 210

Jan jic)对科索沃地区和平的贡献,并生动地称这位神父为“数码僧侣”<sup>①</sup>。

### 三 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的历史流变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到金融危机引发人心惶惶的今天,欧美学者针对宗教与当代国际政治事务,尤其是宗教与冲突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冷战前较为局限的国内政治讨论阶段、《国际宗教自由法》颁布前视宗教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地域性讨论阶段、“9·11”之前相对乐观的全球性宗教积极作用讨论阶段、“9·11”之后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进行细致划分和全面讨论阶段。

冷战结束之前西方学术界就对宗教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有所涉猎,但主要一部是分将宗教视为利益集团、政党联盟的思想基础,基本从国家内部政治制度角度出发,对外部影响略有触及。这一部分研究的议题也比较微观,大多是一些被宗教界视作伦理问题和政治家眼中的社会问题,比如:抗击艾滋病、死刑存废、环境和健康问题等等,当然也关注试图提供军事援助制裁非正义异教这类比较有“世界视野”的热心群体。另一部分的立足点是以政治势力斗争的眼光考察诸如中东战争、伊朗什叶派革命之类涉及宗教信仰抗争的重大突发事件。<sup>②</sup>第二阶段是自冷战之后到世界上仅剩的唯一霸权国美国于1998年出台《国际宗教自由法》之间。这一时期,针对宗教与国际冲突领域的各种论著主要是将宗教视为替代意识形态统治的新载体,<sup>③</sup>代表着西方理论界逐渐跳出国家内部政教关系格局研究的窠臼,同时涌现了大量对宗教与国际关系宏观性抽象的理论

① 科索沃西部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修道院的萨瓦神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建立了英文和塞尔维亚文的修道院新闻网页,向外界实时公布修道院对包括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在内的难民提供帮助以及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对建立地区和平的努力的相关信息,萨瓦神父甚至还建立了网络论坛和聊天室提供不同意见的各方对话的平台。See Tanenbaum Center for Intemligious Understanding “The Cybermonk”, in David Little ed., *Peacemakers in Action: Profiles of Relig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3-150

② 以冷战末期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学界关于宗教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为例,有艾伦·赫茨克专门介绍分析美国的宗教团体说教活动的博士毕业论文 Allen D. 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另外还有类似 Julie S. Bach & Thomas Modles, *Religion in America*,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1989, 这样探讨美国政治生活中活跃的宗教因素之综合性编著。

③ 冷战后至1998年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典型著作比如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Douglas Johns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等等。

探讨成果。这个阶段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选取宗教性极强的典型地域(如印度和伊朗)来分析论证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共存图景。9月11日世贸双子塔倒塌之前,西方学界价值研究的主要命题是宗教与和平、宗教与冲突、宗教与调解,价值判断上多数以积极的眼光对宗教抱有极大的信任,众多学术研究的结论多落脚在以下观点:虽然宗教有引发暴力的记录,但是宗教是双刃剑,是“神圣的矛盾”,宗教是可以被归置管理的。比如宗教多元化就能够促进和平建设,因而学界和政界在看待宗教复苏的景象上,态度并不悲观。<sup>①</sup>“9·11”之后,以宗教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不仅数量上猛增,而且研究逐渐细化和深化,加强了地域性和针对性。这一时期研究者对宗教的看法和立场逐渐分化,除了仍肯定宗教促进和平的功用之外,<sup>②</sup>有不少研究谨慎地反思,不再盲目乐观,甚至感慨于传统宗教美德的衰败,抑或忧心于某些地区宗教复兴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学者们运用经验的、历史的和实证的多种分析方法试图理论化全球化时代宗教与冲突这组矛盾关系之间的来龙去脉。<sup>③</sup>

从系统宏观的角度专门归纳宗教冲突根源的主要有:美国天主教历史学者、圣母大学的史考特·艾波比所著《神圣的矛盾:宗教、冲突和调解》<sup>④</sup>,他认为在多元化世界里激进的宗教身份认同导致对暴力的理解是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他们无法规避暴行这一“神圣义务”。社会学学者马克·杰根史迈尔开创性的著作《新冷战》提出,宗教民族主义者引发暴力冲突的根本目的是寻求其政治身份的合法性,最终形成的政治局面并不会偏离西方期望的民主太远,<sup>⑤</sup>而他的新著《全球叛乱: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仍维持前作的基本观点:只要加以引导,宗教激进主义可以与世俗世界调和存在。<sup>⑥</sup>英国学者奥利

① “9·11”之前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见以下著作: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 Scott Appleby, *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 Religion,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0; Joseph G. Bock, *Shaping Conflict Management: Religious Leadership and the Double-edged Sword*, London: Praeger, 2001等等。

② “9·11”后对宗教与和平建设持肯定态度的论著比如 Harold Coward & Gordon S. Smith eds., *Religion and Peacebuildi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③ “9·11”之后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见以下著作:O liver M dEman, *Violence in God's Name*, Steve Bruce, *Politics and Religion*, Cambridge: Polity, 2003; Jonathan Fox, *Religion, Civilization and Civil War: 1945 through the New Millennium*,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x,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等等。

④ R. Scott Appleby, *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 Religion,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pp. 81-85

⑤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pp. 193-202

⑥ Mark Juergensmeyer, *Global Religions: Religious Challenge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252-257.

弗·麦特南 (Oliver M cTeman) 在《神义的暴力: 冲突时代的宗教》中认为, 宗教激发的冲突尤其是宗教恐怖主义的普遍目标是使宗教成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石, 偏激的暴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长期以来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在世俗论者主导的世界里人为地排除原本实质存在的宗教。<sup>①</sup>

近年来在冲突的宗教介入方面, 研究成果以色列学者乔纳森·福克斯为多。福克斯利用成熟的 MAR<sup>②</sup> 数据库, 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综观他认为的冷战后对国际安全局势形成的两大威胁: 种族和宗教冲突。他在 2002 年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晚期的民族宗教冲突》中认为, 大多数情况下宗教只有与社会生活中的少数民族结合才具备冲突潜质, 宗教若遇上主流民族不见得对冲突有效。<sup>③</sup> 福克斯在两年之后完成的《宗教、文明和内战: 从 1945 年到新千年》提出, 宗教即便影响冲突也只是冲突的中间变量。<sup>④</sup>

着眼于解决冲突和建设宗教和平共存的专著, 主要有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冲突问题学者马克·格平撰写的《伊甸园与末日大战之间: 世界宗教、暴力与调解的未来》书中认为虽不能否认宗教可能导致冲突, 但宗教更给予了建构全球性共同体所需的可供分享的共同道德准则, 有益于冲突解决策略的形成。<sup>⑤</sup> 他另一部著作更明确地将关注重点指向中东地区, 《怪战、圣和平: 宗教如何能带给中东和平》将中东问题积重难返归咎于相关个人和群体所采取调解策略的失误, 同是一神教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基于宗教的和平新关系需要结合宗教和世俗两条路径。<sup>⑥</sup>

聚焦于从教际关系考察地域性宗教冲突的代表性理论专著, 有选取生活在基督徒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边界区域内少数派宗教族群作为个案的《宗教少数派、民族国家和安全: 从巴尔干到东地中海的五个案例》<sup>⑦</sup>, 波斯尼亚学者马里奥·阿波斯托洛夫 (Mario Apostolov) 在此书中考察了信仰交叉地带的集体暴

① Oliver M cTeman, *Violence in Gal's Name: Religion in an Age of Conflict* p. 20

② The Minorities at Risk Dataset <http://www.cidcm.umd.edu/mar/>

③ Jonathan Fox, *Ethnoreligious Conflic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 General Theo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pp. 143-144

④ Jonathan Fox, *Religion, Civilization, and Civil War: 1945 through the New Millennium*, p. 9

⑤ Marc Gopin, *Between Eden and Armageddon: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 Violence and Peacemak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13

⑥ Marc Gopin, *Holy War, Holy Peace: How Religion Can Bring Peace 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98-228

⑦ Mario Apostolov, *Religion Minorities, Nation States, and Security: Five Cases from the Balkans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1, p. 39

力与国际安全问题。

宗教与冲突化解和和平重建方面的典型著作有大卫·斯莫克的《战争的宗教视角: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军事观》<sup>①</sup>和《和平主义: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非暴力与国际冲突观》<sup>②</sup>,这两本著作比较了当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神学家与激进分子对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的观念交锋。伦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海恩斯(Jeffrey Haynes)的《宗教与发展:冲突还是合作?》<sup>③</sup>给出了有关发展的宗教回答,本书考察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内那些基于信仰的组织为冲突后当地的自然可持续发展、医疗、教育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sup>④</sup>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研究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的热潮涌现,针对宗教恐怖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论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如美国路德宗宗教学者马丁·马蒂(Martin E. Marty)和史考特·艾波比合作主编的百科全书般宏大具体的五卷本《基要主义研究》<sup>⑤</sup>,是目前宗教冲突研究领域引用率极高的学术著作。

西方科索沃地区宗教状况与冲突领域的相关研究往往是伴随着铁托去世、冷战结束、科索沃战争直至科索沃独立这些节点、突发或重大事件才逐渐引人注目,侧面反映了宗教仅是西方世界在试图干预这一地区局势之时寻找的借口之一,事实上,在科索沃群体对抗中宗教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因素对研究不重要。有关巴尔干地区特别是科索沃境内东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教际关系以及同一地域发生的暴力冲突的专著,主要三种研究路径:一是主要由传统教会主持编纂通过表现受害者处境,旨在谴责外部对待不同宗教群体采取双重标准,比如数次再版修订的《十字架上的科索沃:被摧毁与被亵渎的科索沃塞塞尔维亚正教教堂与修道院》<sup>⑥</sup>、《天使为何降临:从拜占庭到科索沃的东正

① David R. Snock, *Religious Perspective on War: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Attitudes toward Force*, Washington, D. 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2, pp. 33-46.

② David R. Snock, *Perspectives on Pacifism: Christian, Jewish and Muslim Views on Nonvio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 D. 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5, pp. 49-60.

③ Jeffrey Haynes,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53-74.

④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 Vol. 1-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⑤ Raika and Prizren Orthodox Diocese eds., *Crucifial Kosova: Desecrated and Destroyed Orthodox Serbian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Kosovo and Metohija (June 1999 - May 2001)*, Beograd: "Glas Kosova i Metohije", medijsko-izdavački centar Eparhije Raske-prizrenske Srpske Pravoslavne crkve, 1999, pp. 1-60.

教欧洲》<sup>①</sup>；二是用文化人类学的范式探讨科索沃族群间的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正是作者杜伊辛格斯在科索沃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三是以军事和政治战争为切入点，以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外交行为为展示舞台，仅简略地提及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在暴力冲突中起到的作用，也多以宗教领袖为考察对象。在有的研究者看来，这些积极介入科索沃冲突的宗教领袖几乎就等同于民族主义者，其宗教身份相对而言不过是被利用的政治资本和工具。科索沃宗教冲突方面，第三路径的研究著作最为主流，却往往没有能够深入探究信仰在科索沃动荡的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具体模式，也缺乏对宗教学意义上宗教本身多层面和完整的分析判断。比如媒体人提姆·犹大 (Tim Judah) 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出版的《科索沃：战争与复仇》<sup>②</sup>还有相隔两年后昆士兰大学亚历克斯·贝拉米教授所著的《科索沃与国际社会》<sup>③</sup>，以及专注于后共产主义时期巴尔干地区冲突的英国学者汤姆·嘉拉格 (Tom Gallagher) 的《新千年的巴尔干：战争与和平的阴影》<sup>④</sup>。论文形式的有提姆·犹大“塞尔维亚人：历史的香甜与腐朽之气”<sup>⑤</sup>、乔纳森·福克斯的“国际政治中被忽略的宗教因素”<sup>⑥</sup>、诺尔·马尔库姆的“古老仇恨？”<sup>⑦</sup>、圣母大学杰拉德·鲍沃斯 (Gerard E. Powers) “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宗教、冲突与和解的前景”<sup>⑧</sup>、乔治敦大学约翰·埃斯波西托 (John L. Esposito) “对科索沃危机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重新思考”<sup>⑨</sup>等等。应该说大量科索沃宗教冲突著作集中于 1998 年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内战之后到 2004 年之前，近几年相关研究略显

① Victoria Clark *Why Angels Fa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 77-92

② Tim Judah *Kosova War and Revenge*, pp. 141-2, 158-160, 287-288

③ Alex J. Bellamy, *Kosovo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3, 7, 109, 150

④ Tom Gallagher *The Balkans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the Shadow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vii-xii

⑤ Tim Judah, "The Serbs: The Sweet and Rotten Smell of History", *Daedalus*, Vol. 126, No. 3, Summer 1997, pp. 23-45.

⑥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3, Autumn 2001, pp. 53-73

⑦ Noel Malcolm, "What Ancient Hatred?",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9, pp. 130-134

⑧ Gerard E. Powers, "Religion, Conflict and Prospects for Reconciliation in Bosnia, Croatia and Yugoslavia", pp. 221-252

⑨ John L. Esposito & Vali R. Nasir, "Rethinking U.S. Foreign Policy & Islam after Kosovo",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Spring 2000, pp. 15-25

沉寂, 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这一话题重新成为热门,<sup>①</sup>遗憾的是, 现有的西方科索沃冲突研究结论仍然停滞于所谓痛悼“种族清洗”造成宗教人权悲剧和外部“人道主义”干预是否具有合法性两个角度, 而罕有对真正导致科索沃悲剧的西方干涉政策进行批判和反思。相比较而言, 中国学者对科索沃问题的研究多从地缘政治、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分析科索沃战争, 比如郝时远的《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 从南斯拉夫的历史解读科索沃的现实》<sup>②</sup>、王逸舟主编的《单级世界的阴霾: 科索沃危机的警示》<sup>③</sup>等。但中国学者关注科索沃冲突过程中宗教因素作用的专门论述不多, 科索沃民族问题研究略有提及, 比如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sup>④</sup>、“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sup>⑤</sup>、“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sup>⑥</sup>, 汪丽敏的“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sup>⑦</sup>等等, 未见集中研究科索沃地区具体宗教类别、宗教团体、宗教个人、宗教场所与地区暴力冲突专门著述。国内学界的基本观点是前南地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掺杂了宗教因素, 是宗教民族主义, 美国和北约的干预制造了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而不是当地的民族宗教对立。

#### 四 基本分歧和研究桎梏

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在观点上的主要争议基本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宗教对地区冲突产生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宗教信条往往倡导宣扬仁爱, 因而宗教可以有效减少信徒们的攻击, 并且宗教在冲突破坏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卓有成效, 再进一步, 受安全阀理论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即便出现有宗教介入冲突事件的发生, 但客观结果仍然以产生社会聚合为主。反对观点认为, 纵观人类历史, 常常是宗教分歧本身挑起了残酷战争。当然这组争辩常以折中又两可的“双刃剑”观点告终; 其二, 宗教对地区冲突是否负有主要责任。在亨廷顿看

① See Tim Judah, *Kosovo: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VIII, 140.

② 郝时远:《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③ 王逸舟主编:《单级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④ 余建华:《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⑤ 余建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第24-31页。

⑥ 余建华:“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世界历史》2006年第10期,第69-77页。

⑦ 汪丽敏:“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30页。

来,宗教断裂线是识别冲突地理边界的最根本依据,是塑造冲突和分裂心理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宗教人士也悲观地承认目前媒体大量灌输且人们也广泛接受宗教是冲突爆发的原因,而不是冲突解决的良方之类的观点。<sup>①</sup>但不同的是,比如查尔斯·彭特兰(Charles Pentland)反功能主义的结论就认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和经济增长差异,宗教不过是在发展不平衡基础上导致的局部身份重新定位;<sup>②</sup>其三,宗教对冲突的作用方式是积极介入式的还是消极膝跳式的。在大多数冲突研究者看来,含有宗教因素的冲突中宗教介入基本都是积极的,不论是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相悖引发冲突,还是宗教志愿者中途加入战团都是主动施为。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宗教不过是冲突的受害者,所有涉及宗教因素的暴力行为是因为相关利益受到损害之后被动的消极应对,宗教并不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绝对强者。以上三方面的论点各执一词,难以避免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同时也容易遇到削弱理论的经验现实反驳而捉襟见肘。

综合冷战后西方学界研究宗教地区性暴力冲突研究,虽然学者们在暴力冲突的宗教根源、宗教在冲突过程中的介入和宗教参与冲突后和平建设三个方面有所涉及,但是受西方特有的信仰传统和思维惯式局限,目前的研究存在三方面值得商榷的内容:其一是“政教分离”的内定逻辑。源于西方长来自诩成功的政教分离经验,许多研究学者在关注卷入冲突中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时,往往先验地认定他们是并且应该是与现实政治斗争绝缘的。这样的心理暗示会造成两个后果:要么人为地淡化了宗教对暴力可能的鼓动,要么过分看高宗教对和平调解的推动能力;其二是当民族、种族、文化与宗教这几组相互交织的因素同时出现在暴力冲突中时,西方研究倾向于把冲突的主因和祸首归咎于世俗的因素而并非宗教。一方面认可宗教是双刃剑,另一方面又认为宗教会产生负面作用是被其他博弈中的力量利用的结果。这类冲突研究忙于表达对精神灵性的尊重,却很少拿出剖析民族主义一般的中立立场;其三是在宗教冲突研究中仅关注宗教原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而忽略其他宗教运动的负面效应。宗教原旨主义和宗教现代化运动是宗教应对现实世界高速发展殊途同归的应对策略,最终目的都指向肯定和维持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地位。至

<sup>①</sup> See Tanenbaum Center for Interreligious Understanding “The Peacemakers in Action”, in David Little ed., *Peacemakers in Action: Profiles of Relig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pp 3- 4

<sup>②</sup> Charles Pentl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3, p.



于西方文献关于巴尔干地区冲突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大部分有几个极端取向:要么怀古,具有浓重的文艺气息,从东正教的拜占庭缅怀、歌颂、比较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要么现实,重视寻求整体、宏观或者强大外部政治群体的立场审视巴尔干,从东方问题剖析到南联盟解体;要么源于对大战的不安回忆而谴责发生在巴尔干的暴行,最终还是回归到对文化因素与民族行为模式的声讨。

总之,对将来的宗教与冲突研究来说,我们宜先对宗教和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进行细化区分,进而厘清作为民众社会政治生活中主体身份的宗教与作为权力政治、霸权争斗和战争冲突中客体身份的宗教之间的差异,以超越对形成宗教性暴力冲突模棱两可的根源性分析,还原暴力冲突真实的行动特质。宗教和民族原本只是区分人群的一系列观念习俗差异,自身并不具有攻击性质,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以宗教或者民族划界的地区内群体对抗,其内核不过是一定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还是激进民族主义都已经偏离了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的正统轨道。

(作者简介:章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叶斌)

integration was the cornerstone of Ukrainian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reform, which was very different with his predecessor Kuchma's so called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It thus indicates clearly the change of the Ukrainian perception of the ENP. On the whole, EU-Ukraine relation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es in the post-EU eastern enlargement. Meanwhile, Russia as well as Ukrainian domestic political uncertaint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U-Ukraine relations.

115 **Disparities i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mong the EU, US and Japan since the Mid-1990s**

ZHANG Mingzhe

Disparitie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productivity among the EU, US and Japan started to emerge in the mid-1990s.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the EU-KL-EMS database to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isparities from two aspects: 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industrial sectors. Seen from the first aspect, it i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at contributes most significantly to the disparities, while from the second one, it is the market service industry (especially distribution and financial business service) that produces the greatest impacts on the disparities.

130 **An Overview of the Western Scholars' Study on Religions and Regional Conflicts**

ZHANG Yuan

The worldwide resurgence of relig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ems to have generated a fresh recurrence of violence, with the case of Kosovo the most typical. In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 Western academics have been exploring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s and regional conflicts and identified the role of religions in regional conflicts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After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scholars'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igions and regional conflicts by taking Kosovo's religious conflict as a case stud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debate on the effect of religion is inevitable and that the objectivity of the Western scholars on this subject is questionable.

## ACADEMIC ACTIVITIES

147 **The 2009 Annual Meeting of CAES: China-Europe Relations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SONG Xiaomin